

中原突围中的舆论战

■高 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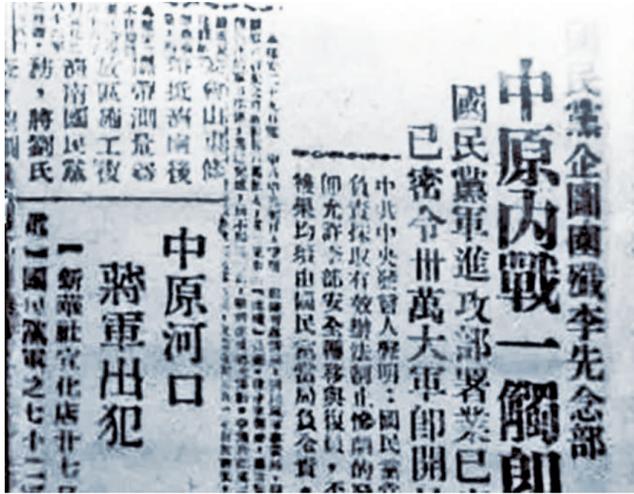
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是解放战争的首战。我军中原部队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周有固敌的不利情况下，在鄂、豫、皖、川、陕境内创立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牵制敌30万重兵。此役中，我军灵活运用舆论战，取得了良好成效。

揭露敌方阴谋。从1945年8月至中原突围初期的1946年6月，我党通过报纸宣传、领导人宣讲、印发材料和座谈会等方式，积极教育引导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兵民思想高度统一。

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残酷的。”我党提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的口号，掌握政治主动。国共两党宣布停战后，中央宣传部适时发出《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要求“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介石会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他会在目前时局中，在武装斗争结束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始终绷紧打仗的弦。

1946年4月，《解放日报》报道国民党反动派以11个军26个师30余万人，从各个方向对中原军区实行包围的计划已经完成，并揭露“自1月10日停战令下达至4月13日止，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对我进攻225次，进攻点227处，侵占我城镇村片124处”，将敌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公之于众。

扰乱敌方阵脚。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响应我党号召，拒绝蒋介石内战命令，率领1万余人于邯郸磁县举



《新华日报》报道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

行起义，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通电，在国内引起轰动。我党借势推力、主动出击，指出“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有全国意义性质的重大事件”。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点上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

为进一步瓦解敌军，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中央决定直接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舆论攻势。在《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中明确，“认真对顽军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浅显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男儿要学高树勋”“日本打完了，全国应该和平了，你们应该复员回家了，为什么老远的从

南方到北方来打八路军”，通过直白的语言，动摇瓦解敌军军心士气。

夯实群众基础。中原突围前期，我军中原部队遭遇重重困难，军民长期缺乏衣食，而此时国民党军队还大举加强对中原地区的封锁，军民处境雪上加霜。

为揭露国民党军的暴行，宣扬我人民军队性质，争取广大群众支持，我党对敌展开了有力的舆论攻势。《新华日报》接连刊登《国民党军封锁进攻双管齐下 新四军第五师陷绝境》《为新四军五师呼吁》《国民党军加紧封锁进攻 新四军五师处境危急》等文，宣传驻地军民严重粮荒、食用草根树皮等窘迫境地，不断揭露敌好战恶行，这些呼吁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响应，相继有一批大学生将捐款2万元及慰问信托新华

日报社转交中原部队，7名公务员将捐款4500元及慰问信托新华日报社转交中原部队。重庆某工厂女工致函新华日报社，并附捐款1万元，信中写道，“我们是知道政府不让人民的军队生存的，但我们人民自己要帮我们自己的军队解危”。

激励我方士气。中原突围期间，军事上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人气势汹汹，叫嚣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我党通过正面激励，引导官兵树立战胜反动派的必胜信心。

在七七事变九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向全国同胞发出《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号召全国同胞树立“敌必败，我必胜”的思想和信念：“目前民族的危机仍然严重，我们的奋斗虽然还要经过许多曲折，但是我们的前途却是无限光明的。”“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统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该文刊发后的第二天，中央宣传部即发出《关于学习与宣传“七七”宣言的指示》，要求全党开展“七七”宣言讨论，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号召党外人士参加座谈讨论，实现政见统一，并将“宣言”编印散发。随后，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中，分析了党必须打败蒋介石的原因和条件，指出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方法，并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进一步鼓舞了广大军民战胜蒋介石反动派的信心。

史说新语

来自太空的无线电波

格 鲁 乌 为 苏 联 首 次 太 空 飞 行 保 驾 护 航

■李子实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号宇宙飞船首创人类进入太空的纪录。在108分钟的飞行和返回地球过程中，他与地面的所有通信联络全部由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的无线电侦察部门保障。

从人造卫星入手

1957年春，时任苏联国防部第4研究所副所长、航天火箭技术专家尤里·莫兹若林中校带着一份国家级任务来到格鲁乌。当时，苏联即将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而苏联航天部门还没有专门的人造卫星运行监视系统，一旦卫星严重偏离预定轨道无法及时发现。因此，他们计划利用军方的远程无线电定向跟踪人造卫星在轨道上的运动情况，方案是在卫星上安装一个无线电发射机，平时工作频率为20兆赫，电波有效穿过电离层时则为40兆赫。为了让无线电定向人员熟悉情况，开展训练，无线电侦察员和航天部门领导人还专门动用一架图-16飞机搭载卫星无线电发射机，从莫斯科飞抵堪察加再返回，一路上不停发射信号，模拟人造卫星的信号效果。

随着卫星升空日期临近，应用无线电监测卫星飞行状况的技术也日趋完善。彼得·什梅廖夫中将回忆说：“10月4日，我一大早就收到通知说，发射时间定在当天莫斯科时间21点左右。我与鲍·图佐夫上校来到克利莫夫斯克，亲自参加对人造地球卫星的首次观察工作。图佐夫当时是指控远程无线电定向系统的军官小组负责人，在南北方向向站竣工、修建备用站网络、提高无线电侦察能力和应用新技术器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无线电定向站通信系统得到极大完善。”

21点左右，指挥中心通知卫星已经发射，约15分钟后，伊尔库茨克定向站报告接收到卫星信号，并通报了时间和方位。这些数据令人振奋，但指挥中心需要等待第一圈飞行结束后，才能最终确认卫星顺利入轨。在离卫星进入莫斯科定向站无线电能见区计时开始之前，无线电定向员就报告接收到了卫星信号。很快，显示器上的噪点变成了脉冲条，熟悉的信号声越来越清晰。卫星进入无线电能见区前，整个机房都能听到信号声，屏幕上的监视标志变得清晰稳定。机房里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大家热烈庆祝卫星发射成功。10月5日，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宣布，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完善太空通信保障

1959年1月4日，“月球-1”号飞船发射升空，飞抵距月球表面6000公里处；当年9月14日，“月球-2”号飞船首次抵达月球表面；10月4日，“月球-3”号飞船顺利发射，完成了世界首次拍摄月球背面的创举。这些太空飞行，都是由格鲁乌的无线电定向专家们负责保障卫星与地面间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技术越来越臻于完善。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世界首个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人。从发射升空到顺利返回地面，格鲁乌专家可谓目不转睛地紧盯飞行情况，确保加加林与地面通信顺畅。

1961年，为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步伐，格鲁乌虽然成立了由彼得·科斯钦将军领衔的太空侦察中心，但传统的无线电侦察手段仍为宇宙飞船飞行任务提供保障，甚至数次立下大功。什梅廖夫回忆说，有一次飞船着陆系统失灵，返回舱落在东西伯利亚一处原始密林里。当时返回舱的无线电信号非常微弱，几乎难以定位。克利莫夫斯克的无线电定向站长彼得·卡谢耶夫发明并制作了一个可以大大提高无线电定向装置灵敏度的仪器，捕捉到极其微弱的无线电信号，引导着陆点更近的定向站启动设备，最后确定了返回舱着陆地的坐标。搜寻小组终于抢在自毁装置启动前赶到着陆地点，回收了返回舱。

“祖国听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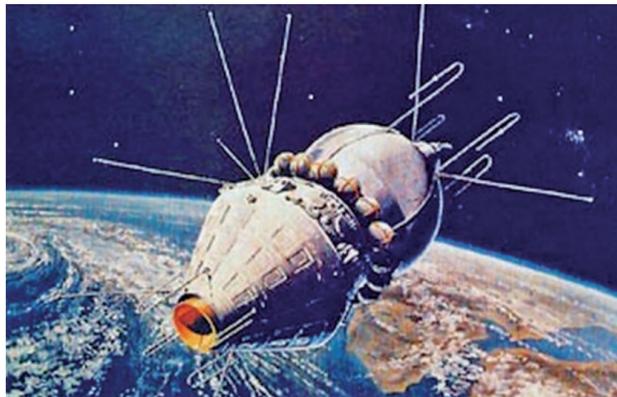
无线电侦察手段曾在搜寻和抢救宇航员时发挥作用。1965年3月18日，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太空行走。

这次试验其实并不顺利：着陆前飞船的自动定位系统失灵，同事帕维尔·别利亚耶夫手动为飞船定向并开启了制动发动机，飞船最终降落在彼尔姆市北180公里处的原始森林中。列昂诺夫回忆说：“我们落到厚厚的积雪里，只有头部露在外面，面面相觑，非常可笑。雪像盐粒一样扎人，四周一片寂静。我们立即打开电台，我像导航员一样用飞船上的电报键开始嘀嗒嘀嗒地发报。可距离太远，有几千公里，既没有应答，也没有问候，什么也没有。”苏联报刊曾在报道中称，搜寻队伍第3天才找到他们，宇航员被迫在雪堆里忍饥挨饿了整整两天。

事实并非如此。2008年3月，直升机驾驶员弗拉基米尔·霍姆科洛夫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透露说，实际上3月19日当晚返回舱一着陆，宇航员们的所在位置就被定位，彼得·卡谢耶夫发明的装置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有一次，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在太空飞行结束后着陆时也发生了意外。无线电侦察员发现返回舱飞行速度过快，立即报告给飞行指挥中心，及时处置了这次情况。

格鲁乌的无线电侦察员们在航天飞行中严密监视飞船运行情况，为宇航员们提供帮助、保驾护航。苏联歌曲《祖国听见了》早在加加林进行太空飞行前就已问世，却在他返回地面之后才迅速风靡全苏联。因为正是有了无线电侦察部门的技术支持，地面人员才真正听到了太空中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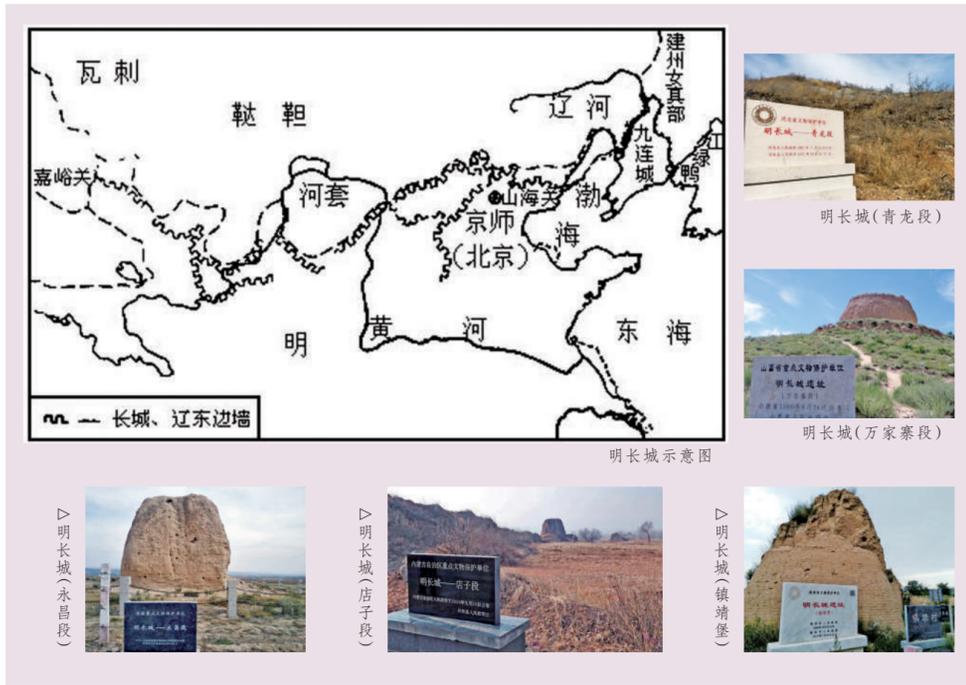
链接历史



苏联画家列昂诺夫和索科洛夫的画作《地球上的“东方”号》

明朝前期戍边方略

■熊剑平



明朝建立后，戍边卫国成为朱元璋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朱元璋一方面以“不征”为主导思想，致力于缓和周边关系，另一方面注意防范主要对手，尤其是北方的蒙元势力。为此在政治、军事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拉拢一帮 严防一方

朱元璋处理国家矛盾的总原则可以概括为：“拉拢一帮，严防一方。”其核心要义是少树敌人，集中力量对付蒙元势力。朱元璋担心后世子孙偏离这一重要原则，于是将其写进《皇明祖训》，并且列入《祖训首章》，定为长期执行的基本国策。

朱元璋以天子自居，视四方为蛮夷，向海外各国颁发《大统历》，希望各国按时向明朝贡以示臣服之心。如果表示臣服，则尊重各国自主权利，允许他们按自己的礼俗进行治理。

为笼络邻邦，朱元璋一贯施行“厚往薄来”政策，不仅优礼接待外国使臣，还特许对方展开自由贸易，并且给予免税的优惠政策。为了不让外国来朝时因携带贡物太多而加重负担，朱元璋特令礼部严格限制贡品数量，对回赐各国的礼物则一再要求从优从厚，以实现“与远适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目标。

为缓和与蒙元关系，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他一方面重兵布防北疆，一方面采用怀柔之策，多次专门遣使致书，对其进行拉拢说服，甚至宣称“华夷一家”，理应一视同仁；“华夷抚御之道，远迹无间。”对被俘的蒙元皇室及其他官员大多以礼相待，甚至加以册封。

从积极征讨到“固守疆宇”

蒙古人在退出中原后，仍然拥有广袤的势力范围和数十万控弦之士。

朱元璋不得不在塞北重兵布防，以消解来自塞外的蒙古贵族势力威胁。从明朝初期来看，其边疆问题主要还是与“北元”残余势力的矛盾。洪武年间，明廷与“北元”之间爆发的战争，规模较大的有7次，规模较小的则难以计数。

为肃清扩廓帖木儿残余，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正月，朱元璋再次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征西将军，兵分三路，出师塞外。此役最终仅冯胜率领的西路战果丰硕，东路则进展不顺。李文忠率军深入蒙古腹地后，遭到蒙元军队的激烈抵抗。由于轻敌，明军在断头山一带接连遭受败绩，丧师万余，损失惨重。

20多年后，朱元璋回忆此役仍后悔不迭，称当时应该“正欲养锐，以观胡变”。此役过后，朱元璋深感蒙古军事力量强大，一时难以平定，于是将积极进攻的策略改为积极防御，“固守疆

宇”。这一策略的改变，与时势变化直接相关，也是基于双方实力的考虑。

加强戒备 筑牢防线

明朝对蒙元的策略由积极进攻转为“固守疆宇”，体现的是积极防御思想。明军虽不再轻易挥师越境、穷追猛打，但仍须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做好战争准备，以随时应对来犯之敌。

朱元璋用兵，非常强调实力为本。朱元璋曾与文武大臣探讨用兵之道，指出：

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胜，多胜少败。

这里所说的“本”，就是指军事实力。为此，朱元璋非常重视平时战备，即孙子所强调的“先为不可胜”。

为保证边境兵力，朱元璋对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国推行卫所制：“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这种新的军事体制将耕种与防务合而为一：设置卫所，立足点在防务，所以要占据要害之地；卫所通过屯田实现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国家补给粮食，还能够稳定保障兵源。

明朝将蒙古视为防卫重点，因此在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境配置了大量兵力，并将严防蒙古的战略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们“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初在北方布置兵力100多万，占全国兵力的一半左右。朱棣即位之后，又增设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卫营、神机营，全部由精锐骑组成，装备火枪、火炮等火器。这也导致一旦北边有事，坐镇都城应天（今南京市）的朱元璋难免鞭长莫及。为此，朱元璋不得不仰仗诸皇子，命他们率重兵镇守各处要津，利用大小藩王构筑起一道戍边的坚固防线，藩王也因此有了“塞王”之称。

为提高防御能力，明朝自洪武年间开始修筑长城，希望借助坚固的城墙阻挡蒙古骑兵的南下袭扰。自先秦时期便开始修建的万里长城，因朱元璋推行积极防御的战略，其功能再次受到重视。

明清兵学